

Crespo, R. F. (2003). Three Arguments Against Menger's Suggested Aristotelianism. *Journal des conomistes et des tudes Humaines*, 13(1).

## 反对门格尔所谓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三个论点\*

里卡多·F. 克雷斯波 (Ricardo F. Crespo)

### 摘要

专家们经常认为门格尔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强烈影响。

本文表明, 尽管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总体框架, 但在某些问题上, 门格尔的结论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

这暗示着门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了解不够深刻和精确, 不足以完全把握其精神。

第二部分阐述了门格尔对应用于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概念与亚里士多德将经济学视为实践科学之间的差异。

第三部分认为, 关于对精确研究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在方法论上的荒谬, 门格尔的主张并非真正符合亚里士多德思想。

第四部分涉及门格尔有机社会制度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立场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 门格尔、亚里士多德、经济方法论

## 1. 引言

一些学者承认亚里士多德对卡尔·门格尔的认识论、社会思想和经济思想产生了影响。<sup>1</sup>事实上, 门格尔经常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他的著作中, 他说他正在寻找经济现象的本质 (essence) 或性质 (nature); <sup>2</sup>他发展了基于亚里士多德概念的价格理论; <sup>3</sup>他提出了一个部分受亚里士多德思想启发的认识论框架; <sup>4</sup>最后, 他有时会直接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sup>5</sup>所有这些都支持这一观点, 即门格尔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然而, 正如 Max Alter 所做的那样, 可以对这两点提出疑问: 门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确切性质,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渗透到门格尔经济思想核心的程度。<sup>6</sup>

---

\* 我感谢 Jack Birner、Neelkant Chamilall、Uskali Makki、Miguel Alfonso Martinez Echevarria、Barry Smith 和 Gabriel Zanotti 的评论。通常的警告适用。本文的前一版本发表于 2001 年 6 月 22 日在门多萨北卡罗来纳大学哲学系举行的第二届亚里士多德会议和 10 月 3 日至 5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经济方法论学会第二届研讨会。

<sup>1</sup> 比照, 例如, Kauder-1953 and 1957, Rothbard-1976, pp. 68ff., Bostaph-1978, p. 146, Chamilall-2000, Cubeddu-1985 and 1993, Mäki-1990a, pp. 295ff., Smith-1986, Smith-1990, Smith-1994a, and Smith-1994b, 各处。

<sup>2</sup> 参见, 例如, Menger-1871 [1950], pp. 5-8.

<sup>3</sup> 参见, 例如, Menger-1871 [1950], pp. 295-6, 305-6.

<sup>4</sup> 参见, 例如, Menger-1883 [1985], pp. 148-9, 220-2, Cubeddu-1985 and 1993, Alter-1990.

<sup>5</sup> 参见, 例如, Menger-1871 [1950], pp. 53n., 277n., 286, 295-6, 296n., 305-6, 315-7, Menger-1892, p. 241, 以及 Menger-1883 [1985], pp. 57, 88, 148, 149n., 151, 153, 163, 165-6, 169, 184, 189n., 220-2.

<sup>6</sup> 比照 Alter-1990, pp. 112ff..

在这篇论文中，我对这一论点，即门格尔接受了一种唯一的正统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同等程度地影响他思想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三个反对意见。<sup>7</sup>首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而不是门格尔所坚持的理论科学。然而，门格尔对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exact orientation*）更像是一门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而不是一门实践科学（第2节）。其次，即使我们将我们的出发点接受为经济学的概念是一门理论科学而非实践科学，门格尔的论点，即假设我们可以通过经验证据检验从精确法则（*exact laws*）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荒谬”，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第3节）。最后，虽然门格尔对所谓“有机制度”起源的解释可以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但这些有机制度的运作方式却不能（第4节）。

## 2. 经济学：实践科学还是理论科学？

在介绍上面提出的第一个反对意见之前，必须先分析亚里士多德和门格尔的科学分类，并检查经济学在其中的认识论地位。

### 2.1.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思辨或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技术科学。这些科学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主题。理论科学的对象是研究分离的存在物、不变的存在物和在其自身内具有运动原理的存在物。实践科学的主题是自由的人的行动，其运动原理是**选择**（*proairesis*）。最后，技术科学处理的是这样的存在物，其运动原理是工匠的头脑和能力。<sup>8</sup>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

“因为在生产科学的情况下，生产原理在于生产者而非产品，它要么是一门技艺（*art*），要么是其他能力。同样，在实践科学中，运动不在于所做的事情，而在于做事的人。但是自然哲学家的科学处理的是本身具有运动原理的事物。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然科学既不是实践性的也不是生产性的，而是理论性的（因为它必须属于这些类别中的某一类）。”<sup>9</sup>

亚里士多德还在他的《后验分析》（*Posterior Analytics*）中处理了科学，这是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Organon*）的书。在《后验分析》中，他写道，科学是对必然对象的可靠、真实和确定的知识。<sup>10</sup>它是关于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关于“属于某物的任何事物，既属于每一种情况，又属于某种事物本身”。<sup>11</sup>普遍性表明了原因。<sup>12</sup>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

---

<sup>7</sup> 我想强调，本文基于的是现今编辑过的门格尔作品。对门格尔未发表的作品进行新的研究可能会证实或推翻我的结论。Chamilall/Krecké-2002 是对探索门格尔未发表笔记的一次真正尝试。

<sup>8</sup> *Metaphysics*, VI (E), 1, 1025b.

<sup>9</sup> *Metaphysics*, XI (K), 7, 1064a 12-ss.

<sup>10</sup> 比照 *Posterior Analytics* 4, 73a 23-4; 6, 74b 14; 8, 75b 24; 另见 *Nicomachean Ethics* VI, 3, 1139b 23-4.

<sup>11</sup> *Analytics II*, I, 4, 73b 26 and also cf. *id.*, I, 31, 87b 28-35; *De Anima*, II, 5, 417b 23; *Metaphysics* E, 2, 1026b 24 - 1027a 20 and K, 8, 1064b 27 - 1065a 5.

<sup>12</sup> Cf. *Analytics III*, 31 88a 5.

说，科学是通过事物的原因来认识事物（the knowledge of things by their causes）。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科学定义只包括理论科学的特征。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科学不是前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类比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是“根据相似性”（*kath'omoitesin*）的科学，其中应用了不同的特征。<sup>13</sup>一方面，人的行动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另一方面，实践科学并非像理论科学那样在本质上漠不关心。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较弱”的科学的严格科学概念。这是关于必要事物的严格科学与实践智慧和行动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科学”是一个类比概念。“类比”是目前用来表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同名异义核心含义（*homonymous pròs hén*）<sup>14</sup>概念”的术语。这些概念具有不同但相关的含义，其中一个“焦点”或主要含义，它指代并联系着其他衍生含义。从亚里士多德到我们这个时代，习惯性提供的例子是“健康”：健康的焦点含义是指人体、药物、食品、运动、散步等，也可以衍生为健康，这是一个常见的属于它们所有的特征。<sup>15</sup>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些被视为科学的知识的共同特征是“证明能力的状态（*héxis apodeiktiké*）”，<sup>16</sup>即一个证明过程。因此，实践科学是科学，尽管它没有必要的主题，因此，它们的结论也不准确。实践科学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由于人的行动的偶然性源于人的自由和独特性，实践科学承认其结论的不精确性。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亚里士多德断言：

“现在我们对这门科学的处理就足够了，如果它达到了属于其主题的那种精确度。不能期望哲学的所有部门都具有相同的准确性，就像所有的艺术和手工艺产品一样。（……）因此，如果在处理主题并从如此不确定的前提开始时，我们必须感到满意，我们成功地呈现了一个广泛的真相轮廓：当我们的主题和前提仅仅是一般性时，我们到达就足够了得出普遍有效的结论。”<sup>17</sup>

鉴于其主题的性质，我们不应该向科学索取比它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不应将这一局限归咎于科学，因为它并不能证明缺乏科学性，而是“案例的性质：行为的材料本质上是不规则的”。<sup>18</sup>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具有本体论

（*ontological*）性质，它最终反映了人的自由，这是人的行动的本质的和普遍存在的特征。

---

<sup>13</sup> 该解决方案由 Gauthier and Jolif (*Éthique à Nicomaque avec Commentaires*,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Louvain, Béatrice-Nauwelaerts, Paris, 1970), II, pp. 23-5 and pp. 453-5 提出，依据 *Nicomachean Ethics*, VI, 3.

<sup>14</sup> 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同名异义”即一个词的不同含义，而“核心含义”被用来“聚焦”存在的不同感觉，就像一个关于不同颜色光的棱镜，亚里士多德用来解释“核心含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hugieia*）和“医学”（*iatrikē*）。——译者注

<sup>15</sup> 比照 *Metaphysics*, IV, 2, 1003a 32 and ff..

<sup>16</sup> 比照 *Nicomachean Ethics*, VI, 3, 1139b 32. I developed further on this topic in Crespo-1997, Chapter 2.

<sup>17</sup> *Nicomachean Ethics* I, 3, 1094b 11-27.

<sup>18</sup> *Nicomachean Ethics* V, 10, 1137b 17-9.

其次，实践科学必须与具体案例密切相关。这个特征是前一个特征的直接结果。“现在，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说，“从已知（known）开始是正确的。但是“已知”有两种含义——“我们所知道的”（what is known to us）是一回事，而“本身可知的”（what is knowable in itself）又是另一回事。那么，也许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从我们所知道的开始是合适的。”<sup>19</sup>有必要根据其文化和历史环境对具体案例进行调整。

第三，实践科学具有伦理承诺，它源于每次人的行动的道德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是伦理学。伦理学研究伦理问题本身，而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实践科学则研究其相应的主题。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这些主题不能与其伦理方面相分离，因为无论被分析的行动是什么，它总是具有内在的或实践的方面，这使得它始终本质上是伦理的；相应的科学应该关注这方面。

第四，实践科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的实践目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这种研究【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sup>20</sup>并且“我们进行这种探究不是为了了解什么是美德，而是为了变好（become good）。”<sup>21</sup>他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补充说，“理论知识的目的是真理，而实践知识的目的是行动。”<sup>22</sup>如今，社会科学是实践学科的理论研究。那么可以问：它们的认识论地位是什么？阿奎那在这一点上完善了亚里士多德：他区分了三个原则来决定一门科学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它们是主题、目的和方法。这种三分法为“混合”案例留下了空间，例如上述实践学科的理论研究。阿奎那在《论真理》（*De Veritate*）中断言：

“知识被认为是实践的，因为它要求行动。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有时在实践中（在行动中），也就是说，此时它实际被命令执行某事（……）其他时候，知识可以被命令采取行动，但现在却没有被命令采取行动（……）；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实际上是实践的，但不是在实践中（在行动中）。”<sup>23</sup>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代社会科学实际上是被命令采取行动的。因此，尽管一门特定的科学可能根据目的（*secundum finem*）是理论的，或者可能同时具有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但正是它们对行动的隐含排序决定了它的认识论框架。

最后，应该提到实践科学的方法程序特征。这可以概括为方法论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的倡导。在他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令人钦佩地结合了公理演绎、归纳推理、辩证论证、修辞、想象、案例和主题。

---

<sup>19</sup> *Nicomachean Ethics* I, 4, 1095b 2-4.

<sup>20</sup> *Nicomachean Ethics* I, 3, 1095a 6.

<sup>21</sup> *Nicomachean Ethics* II, 2 1103b 27-28.

<sup>22</sup> *Metaphysics* II, 1, 993b 21-22.

<sup>23</sup> *De Veritate*, q. 3, a. 3. 我感谢 Carlos I. Massini 提供了这段引文。

鉴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问：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有哪些例子？经济学是其中之一吗？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

“因为它【政治学】决定了国家应该存在哪些科学，每个公民群体必须学习什么样的科学，以及每个人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熟练程度。我们进一步观察到，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略、经济学（*oikonomike*）和演讲，都包含在政治学中。”<sup>24</sup>

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经济科学是实践科学之一。对他来说，经济活动是使用美好生活所【主观】必需的东西的行动、习惯和能力，而经济科学是相应的实践科学。<sup>25</sup>

## 2.2. 门格尔的科学

门格尔首先将研究分为两个主要取向，即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sup>26</sup>它们的目的是对现象的个别方面和一般方面的认识。<sup>27</sup>理论取向寻找典型的形式和这些形式之间的典型关系。<sup>28</sup>如果没有这种第二知识，我们将无法深入了解现实世界，无法预测和控制它：“理论科学的目的是了解现实世界，了解超越经验和控制的现实世界。”<sup>29</sup>门格尔确定了第三种知识，他称之为实践科学或技术。门格尔将这种分类应用于经济学，导致历史科学和统计学处理经济现象的各个方面，理论经济学侧重于经济现象的一般方面，经济政策和金融是经济学的实践分支。<sup>30</sup>门格尔在“政治经济学”的标题下汇集了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分支。<sup>31</sup>但是要理解这种将经济学描述为一门科学的含义，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自己熟悉门格尔关于科学功能的概念。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他说：

“学术研究的目标不仅是对现象的**认知【Erkenntnis】**，而且是对现象的**理解【Verständnis】**。当我们获得了一种现象的心理形象时，我们就获得了对它的认知。当我们认识到它存在的原因和它的特性（它存在的原因和它的存在的原因）时，我们就理解了它。”<sup>32</sup>

斜体字对于正确理解门格尔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Mäki 指出，**理解（Verständis）**指的是“一种对**认知（Erkenntnis）**对象的解释性重新描述，它对这些对象的‘更深层’本质做出断言。”<sup>33</sup>我认为 Mäki 是对的。然而，断言

---

<sup>24</sup> *Nicomachean Ethics* 1094a 26-b 6.

<sup>25</sup> 重要的是要强调，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oikonomike* 是家政管理，其目标从属于政治学的目标。当代经济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等价物是从属于 *oikonomike* 和政治学的理财学

（*chrematistics*）的一个分支。我在 Crespo-1997 的第 3 章和第 4 章中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济概念。

<sup>26</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38.

<sup>27</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35.

<sup>28</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36.

<sup>29</sup> Menger-1883 [1985], p. 36.

<sup>30</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39.

<sup>31</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39-40.

<sup>32</sup> Menger-1883 [1985] p. 43,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33</sup> Mäki-1990b, pp. 320 ff., 强调为 Mäki 的文本。

理解就是科学地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知道原因）会更容易和更准确。门格尔说，“当我们以**理论**方式理解一个具体现象时，我们意识到【其】存在的基础和性质的特殊性（……）”：<sup>34</sup>因此，**理解**是古典意义上的科学。<sup>35</sup>

门格尔还认为，我们可以既从历史上又从理论上理解一种现象。<sup>36</sup>这个概念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事实上，谈到理论研究，门格尔指出

“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现象或它们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它们的语言形象（概念）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对象。”<sup>37</sup>

这种说法表明，门格尔并不打算建立复制现实或类似现实的概念和模型，而是要把握现实本身。正如考德所说，对他来说，“法则不是我们头脑的建构，而是对经济生活中永恒配置的描述。”<sup>38</sup>

在理论研究中，门格尔考虑了两个取向，**现实-经验**取向和**精确**取向。现实-经验理论研究“将真实现象的总体以一定的经验形式和经验方式加以安排，以确定它们共存和更迭的规律”。<sup>39</sup>为此，它使用了归纳法，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承认的那样，归纳法无法提供科学的确定性。<sup>40</sup>在这方面，门格尔显然指的是经验归纳法（不是本质归纳法或“抽象”）。当他引用培根的话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sup>41</sup>因此，正如门格尔所理解的那样，现实-经验取向**导致了**其“完整的经验现实”中的**真实类型**和**经验法则**。<sup>42</sup>因此，其结论不可能绝对可靠。<sup>43</sup>现实-经验取向并没有从偶然的特征中抽象出普遍的概念和法则。门格尔通过将其应用到经济领域来阐明这一点：在他看来，在现实的经济行动中，我们不仅有纯粹的经济原因，还有“错误、无知和外力”。<sup>44</sup>

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的目的是确定现象的精确（在绝对可靠的意义上）法则。它的方法是寻求“确定一切真实事物的**最简单元素**”。<sup>45</sup>这样，它就得出**定性上**严格的典型经验形式和典型关系，即**现象法则**。<sup>46</sup>这些

---

<sup>34</sup> Menger-1883 [1985], p. 45,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35</sup> Max Alter 认为 *Verständis*（理解）与德语 *Verstehen*（去理解）概念相关，后者又与 *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相关（Alter-1990, p. 105）。Mäki (Mäki-1997, p. 478, nt. 7) 明确反对他的观点。在我看来——以及在 Mäki 看来——Max Alter 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sup>36</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43-5.

<sup>37</sup> Menger-1883 [1985], p. 37, 脚注 4,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38</sup> Kauder-1957, p. 416. 在给瓦尔拉斯的一封信中，门格尔指出“我们不仅研究数量关系，而且研究经济现象的本质 (das WESEN)。”引自 Hutchison-1973 p. 17, 脚注 5.

<sup>39</sup> Menger-1883 [1985], p. 56.

<sup>40</sup> Menger-1883 [1985], p. 57.

<sup>41</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57 and 60.

<sup>42</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56-7,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43</sup> 正如 E. Kauder 所建议的，在给瓦尔拉斯的一封信中使用的提法——“确定法则”（“des lois fixes”）——更合适，因为除了准确之外，门格尔还意味着绝对可靠；比照 Kauder-1957, p. 103.

<sup>44</sup> Menger-1883 [1985], p. 64.

<sup>45</sup> Menger-1883 [1985], p. 60,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46</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61,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自身具有绝对性的保证”<sup>47</sup>并且它们独立于时空条件而存在。<sup>48</sup>我们通过“抽象”来把握它们。<sup>49</sup>看来门格尔指的是表达本质的普遍原则（universals）。Mäki 似乎是正确的，他认为门格尔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抽象，通过它们（一阶和二阶普遍原则）导致普遍概念和普遍关系。<sup>50</sup>

这些解释有助于显示门格尔的理论精确研究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之间的同源性。然而，正如我将在下面论证的那样，当门格尔将这个方案应用于经济学时，他滑入了一个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从公理开始，然后从公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主题是必要的，并且为得出这些结论而进行的推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在提到这个精确取向时，门格尔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Scire est per causas scire*”（“知道就是因果地知道”）<sup>51</sup>，他说：

“伦理现象领域的伟大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从这些方法论的观点出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以这种观点着手构建社会现象理论的任务。”<sup>52</sup>

### 2.3. 门格尔经济学

对于门格尔来说，将人的需要（needs）与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财货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的根源。<sup>53</sup>他指出，“我们将**经济**理解为人旨在满足其物质需要的前瞻性活动（precautionary activity）；我们将**国民经济**理解为这种活动的社会形式”<sup>54</sup>，然后继续指出，“实际上，只有那些专门为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活动，才被视为经济的，而实际消费财货的行动本身不属于这个概念。”<sup>55</sup>就这些财货而言，并非所有财货都源自经济活动。假想财货仅仅满足假想需要。概括起来，经济行动是一种人的有意的行动。这种认识是现代的、开放的概念。

然而，当门格尔详细说明经济行动的特征时，在其意图性和精确性之间、现实性和理论性之间以及研究的现实取向和精确取向之间，似乎出现了对立。实际上，精确取向需要一种需要一种简化的视野，将自由置于括号里。“人的经济中最原始的因素是需要、自然界直接提供给人的财货（……）以及对尽可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渴望（……）所有这些因素由特定情况最终给定，独立于人的选择。”<sup>56</sup>门格尔在题为“所有人的经济的起点和目标都被严格确定”的附录 VI 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里指出，“经济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先前指出的

---

<sup>47</sup> Menger-1883 [1985], p. 59.

<sup>48</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12.

<sup>49</sup> Menger-1883 [1985], pp. 62, 65 and 218.

<sup>50</sup> 比照 Mäki-1990a, p. 295, 强调为 Mäki 的文本。Smith 也持有此立场（Smith-1990, pp. 266-7 和 Smith-1994, pp. 34-5）。Max Alter 也同意我们正面临基本归纳法（Alter-1990, p. 107）。

<sup>51</sup> Menger-1883 [1985], p. 93.

<sup>52</sup> Menger-1883 [1985], p. 87.

<sup>53</sup> Menger-1871 [1950], pp. 94ff.

<sup>54</sup> Menger-1883 [1985], p. 63,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55</sup> Menger-1883 [1985], p. 193, 脚注 128. 另外比照 p. 217.

<sup>56</sup> Menger-1883 [1985], p. 63.

人的活动起点到达先前指出的目标的方式。”<sup>57</sup>因此，他得出结论，研究它的最佳方法是精确取向：

“上述领域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考察**抽象的经济实在**的现象，如我们所见，这些现象是严格确定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得出有关人类经济的**真实的**——部分是极其不经济的——现象的精确法则，但它确实得出了关于经济实在的精确法则。”<sup>58</sup>

也就是说，得出精确结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它们是不真实的。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观点。科学是关于普遍原则的，不能处理意外事件。然而，有人可能会怀疑，这种抽象是否意味着对经济本质特征的抽象。“精确研究的结果（……）只有在某些前提下才是正确的，而这些前提在现实中并不总是适用。”<sup>59</sup>其中一些假设是：人们受利己主义支配；他们不受错误、无知和外部强迫的影响；<sup>60</sup>并且他们拥有完全的知识。<sup>61</sup>门格尔将人的意志的自由视为区分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元素之一。<sup>62</sup>门格尔无视自由——这当然是经济行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现实经济行动的其他特征。因此，在他的著作中，经济学成为一种确定性抽象的技术。这一立场清楚地体现在他的价格理论的条件描述中，他在其中将完全知识做为假设。<sup>63</sup>这构成了他的方法论框架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他不再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公理演绎法中，而是处于穆勒式的假设演绎**模型**中，具有明确陈述的非现实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预示了20世纪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方法论。<sup>64</sup>

## 2.4. 门格尔的经济学哲学：使用亚里士多德工具的非亚里士多德解决方案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而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有一个相关的核心，即精确的理论取向。这个最终取向至少在其意图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因此，门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转变为了理论科学。我同意 Alter 的说法：

“门格尔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概念，涵盖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诗学【技术】的研究领域。这三个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各自的目标——分别是为了知识本身的知识、为了控制的知识 and 为了获得技能的知识——在门格尔的体系中被分

---

<sup>57</sup> Menger-1883 [1985], p. 217.

<sup>58</sup> Menger-1883 [1985], p. 218,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59</sup> Menger-1883 [1985], p. 69.

<sup>60</sup> Menger-1883 [1985], p. 64.

<sup>61</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71.

<sup>62</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214.

<sup>63</sup> 在 Menger-1883 [1985], p. 71 和 Menger-1871 [1950], 第五章。Kirzner-1979 指出了时间、无知和错误的作用，并因此指出了门格尔思想中的不确定性。基于门格尔的文本，他展示了这些因素的相关存在。然而，他随后指出门格尔如何在价格理论中失去这些成就：“要么我们在门格尔这里有奇怪的**不一致**，要么这里有一些微妙之处有待探索。”（Kirzner-1979, p. 62）。

<sup>64</sup> Zanotti-1996, pp. 165-7 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解为仅属于理论的领域，这种转变与他将经济学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转移到第一哲学领域相对应。”<sup>65</sup>

事实上，在门格尔看来，经济学的精确理论是一种经济学哲学，或者说是一套属于哲学人类学的经济学原理。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有效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意图，但不能不强调它是一个范围狭窄的意图。门格尔说他正在寻找“经济法则”（*Gesetze der Wirtschaftlichkeit*）。<sup>66</sup>然而，当一个人从哲学人类学开始时，关于经济学他只能陈述很少的内容。此外，这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而是经济学哲学。

在门格尔看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只不过是程度之差。<sup>67</sup>真正的区别在于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现实取向和精确取向之间，而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之间的准确性差异只是程度问题。另一方面，本体论的差异存在于取向之间。这一事实，即社会现象产生的规律不如自然现象严格，并没有导致理论科学变得实践化或历史化。<sup>68</sup>附录 V 的标题指出，“在人的现象领域精确法则（所谓的‘自然法则’）可在与自然现象领域相同的形式性预设下建立。”<sup>69</sup>同样，门格尔解释说，这一事实，即抽象经济学仅分析任何现象的某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局部科学，因此应该从属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sup>70</sup>只要精确取向占上风，经济学实际上就被同化为 *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这与奥地利学派完全不同——但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可能算成后者。<sup>71</sup>

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精确取向在其提议中产生了一门理论科学，但如前所述，在其对价格理论的应用中却没有。另一方面，经验-现实主义取向可能包括亚里士多德实践科学的某些方面。门格尔的实践科学或技术科学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而是亚里士多德的技术科学。

正如 Alter 正确指出的那样，

“只有最初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学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科学。经济学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政治学又是实践科学的目标之一。因此，对他来说，经济调查的结果无法进行严格的论证，因为实践科学只产生偶然的知识。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理论并不是门格尔意义上的“精确”。<sup>72</sup>

门格尔选择目的作为科学分类的标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分类标准就是主题。实践科学对他来说是实践的，因为它们的主题是

---

<sup>65</sup> Alter-1990, p. 107.

<sup>66</sup> Menger-1883 [1985], p. 73. 另外比照译者的脚注。

<sup>67</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52, 58-9, 214-5, 219.

<sup>68</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51.

<sup>69</sup> Menger-1883 [1985], p. 214.

<sup>70</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79.

<sup>71</sup> 关于这个话题，比照我的书 Crespo-2000, 第 5-6 章。

<sup>72</sup> Alter-1990, p. 119.

人的行动，而不管研究主题的视角如何。另一方面，对于门格尔来说，如果目的及其方法是理论的，独立于主题，那么理论科学就是理论的。此外，实践一词对门格尔的意义与它对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不同。对门格尔来说，它意味着技术，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意味着人文科学。

很明显，尽管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但门格尔的科学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非常不同。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在改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对抗历史学派。这导致他在一个认识论框架内移动，该框架虽然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之上，但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截然不同。事实上，他的经济理论并不具有上述亚里士多德实践科学的任何特征：不精确性、实践目标、道德性、贴近经验和方法论的多元性。

### 3. 精确取向的绝对正确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命题

理论研究的经验-现实主义取向是研究中必须的第一步。<sup>73</sup>然而，对于门格尔来说，根据经验路径产生的证据，无法纠正精确取向的结论。他认为，试图这样做意味着对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的误解：<sup>74</sup>“它【精确取向】得出了理论研究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不能通过完整的经验现实来检验。”<sup>75</sup>他补充说：

“用完全的经验方法来检验精确的经济理论简直是方法论上的荒谬，没有认识到精确研究的基础和前提。”<sup>76</sup>

这种观点显然将门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在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方面拉开了距离，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检验理论没有任何异议。然而，门格尔在这里的方法论立场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后验分析》（*Posterior Analytics*）中的立场是一致的。让我进一步解释。

亚里士多德关于检验理论的观点并不是一个清晰易懂的话题。如果我们阅读《后验分析》，我们不会遇到经验检验的想法。正如我们在 2.1 节中所说，这本书涉及的是理论科学。科学是论证性的，是一个公理-演绎的三段论系统。科学以绝对可靠的方式从原理得出结论，即直言三段论（*categorical syllogism*）。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处理了如今被称为正当理由的背景。他指出，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因为它们遵循他定义的正当性规则。他不处理发现的背景。用经典术语来说，我们有一个展示过程（*an ars demonstrandi*）而不是发现过程（*an ars inveniendi*）。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方法试图通过寻找相应的前提来证明结论，而不是从这些前提中推断出这些结论。证明是演绎的；演绎将一个命题插入到基础上下文中，从而赋予该命题以科学特征。

---

<sup>73</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66-7.

<sup>74</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69.

<sup>75</sup> Menger-1883 [1985], p. 61.

<sup>76</sup> Menger-1883 [1985], p. 69.

相反，我之前在 2.1 节中进行了解释。实践科学中的方法是多元的：它不仅是演绎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和《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都发展了这种方法论的多元性。然而，这个警告也适用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案例。每一次演绎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全部通过推导得到的。通往原理的道路始于归纳。首先，我们有本质归纳，即对普遍概念或关系的抽象。这假设与经验接触，因为“因此，除非通过归纳法，否则不可能掌握普遍原则。”<sup>77</sup>但这只是第一步，因为在实际科学中，通往原理的道路包括经验、论证的辩证检验和权威意见。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不仅强调了演绎的相关性，也强调了演绎的局限性：演绎需要一个原理不相关的发现背景。科学开始的普遍前提不能通过演绎获得，数学和形式逻辑除外。事实上，在大多数科学学科中，概括需要经验证据以及归纳和辩证过程。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以《后验分析》中详述的方式来处理科学只是例外。J. M. Le Blond 坚持认为“组成《工具论》（*Organon*）的书籍更关注以严谨的方式揭示科学，而不是做科学。另一方面，他的科学书籍侧重于研究，是揭示方法的书籍。”<sup>78</sup>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研究中——尤其是生物学的（《论动物的组成》（*On the Part of Animals*）、《动物志》（*The History of Animals*））、<sup>79</sup>物理学的（《气象学》（*Meteorology*））和实践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为经验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他在为了发现科学原理并验证它们。他在《动物的繁殖》（*Generation of Animals*）中说，“必须相信观察而不是理论，只有当理论所证实的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时，理论才值得相信。”<sup>80</sup>Le Blond 展示了亚里士多德如何在详细观察和实验中使用经验：“研究从事实到理论，从理论到事实的流动和回流。”<sup>81</sup>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男孩可能成为数学家，但不能成为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sup>82</sup>他补充说，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可以求助于经验，而数学家则不能。正如他在《论世代与腐败》（*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中所说的那样，“缺乏经验削弱了我们对公认事实采取全面看法的能力。因此，那些与自然及其现象有密切联系的人更有能力制定广泛而连贯发展的原则。”<sup>83</sup>此外，在《物理学》（*Physics*）中，他从一个经验论证开始解释了为什么某物不能包含在自身中：“因此，如果我们以归纳法（*epaktikōs*）被区别对待；并且可以通过论证看出这是不可能的。”<sup>84</sup>然后他继续根据这一点发展理论论证。<sup>85</sup>

---

<sup>77</sup> *Posterior Analytics*, I, 18, 81b 2.

<sup>78</sup> Le Blond-1939, p. 191.

<sup>79</sup> 关于这部作品，Durant-1943 肯定道：“当然，尽管这些生物学作品存在错误，但它们构成了任何人为科学树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p. 56）

<sup>80</sup> *Generation of Animals*, III 10, 760b 31.

<sup>81</sup> Le Blond-1939, p. 242.

<sup>82</sup> *Nicomachean Ethics*, VI, 8.

<sup>83</sup> *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I 2 316a 6.

<sup>84</sup> *Physics*, IV, 3, 210b 8-9.

<sup>85</sup> 这种思路由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者 M. Mansion, J. M. Le Blond, W. Wieland 和 J. Barnes 发展而来。感谢 Héctor Padrón 和 Alejandro Vigo 就此主题提供的有用建议。

综上所述，门格尔关于对精确研究的经验检验结论进行方法论荒谬的主张与《后验分析》的认识论框架是一致的。但是，门格尔并没有完全捕捉和理解作为真正的科学家（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框架并没有避免通过经验来检验结论，因为抽象来自现实又回到现实，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确实检验了这些结论。

#### 4. 有机创造的社会结构及其研究方法

在题为“对社会现象的有机理解”的《探究》第三卷中，门格尔详细阐述了他对有机结构的理解。<sup>86</sup>根据门格尔的说法，可以区分两种社会现象：一种是有意图的起源，另一种是自发地以非意图的方式起源。门格尔类比了产生自人的计算的社会现象和机械构造（mechanism）。这种制度的例子是那些源于“积极立法”的制度——有时，是法律。“我们通过调查在具体案例中指导社会社团或其统治者建立和推进所讨论的社会现象的目标，来实用主义地解释这些现象。”<sup>87</sup>

属于第二种的现象是自发产生的，需要“有机地”解释。在门格尔看来，此类现象的例子有货币、语言、法律、道德、城市和国家。它们都是“个人目的论因素的非意图社会结果”。<sup>88</sup>此外，他将市场、工资、价格、分工、利率等一些经济制度包括在内，这些制度“不是社会目的论原因的结果，而是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无数努力的非意图结果。”<sup>89</sup>

实用主义的社会制度或现象与机械构造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此外，非意图起源的制度或现象与有机体之间有什么联系？门格尔的机械构造和有机体是什么意思，这两个类比有什么区别？让我从后者开始。门格尔指出：

“当仔细观察时，自然生物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种真正令人钦佩的功能，然而，这不是人的**计算**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结果。同样，我们可以在众多社会制度中观察到一种关于整体的非常明显的功能。但仔细考虑后，它们仍然不能证明是**旨在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意图**的结果，即社会成员达成协议或积极立法的结果。它们在我们面前也更像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产物，是**历史发展的非意图结果**。”<sup>90</sup>

有机解释解释了这种社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但是，请注意“在某种意义上的”这个表述：门格尔谨慎地使用了这个类比：“它是一个不精确的类比”，它并不严格。<sup>91</sup>正当性在于这一事实，首先，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因果关系。<sup>92</sup>其次，社会有机体不是自然力量的产物，而是人的努力的产

---

<sup>86</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p. 127-159.

<sup>87</sup> Menger-1883 [1985], p. 145,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88</sup> Menger-1883 [1985], p. 158.

<sup>89</sup> Menger-1883 [1985], p. 158,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另外比照 Menger-1892, p. 255 关于货币的论述：“货币并非由法律产生。它的起源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国家制度。”

<sup>90</sup> Menger-1883 [1985], p. 130,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91</sup> Menger-1883 [1985], p. 132 以及比照 p. 133.

<sup>92</sup> Menger-1883 [1985], pp. 132-3.

物。<sup>93</sup>然后，因为门格尔想要保护个体：“承认许多社会现象是‘有机体’，与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原子论的！）理解的愿望绝不矛盾。”<sup>94</sup>因此，门格尔在本质上试图通过这个类比强调的是，这些社会现象是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的意外结果，而不是针对这些制度的设计和建立的结果。<sup>95</sup>让我继续谈谈实用主义的社会制度、现象和机械构造，再次听听门格尔的话：

“大量的社会结构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是如此。它们是人针对其建立和发展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如果社会成员同意或积极立法的结果）。这类社会现象通常也表现出部分相对于整体的目的性。但这不是自然“有机”过程的结果，而是**使多种手段服务于一个目的的人的计算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恰当地谈论这些社会现象的“有机”性质或起源，即使类比受到质疑，它们也不是类似于**有机体**，而是类似于**机械构造**。”<sup>96</sup>

最后，根据门格尔的说法，有机体和机械构造有什么区别？让我再次引用他的话：

“有机体与机械构造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它不像后者那样是人的计算的产物，而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的各个部分（每个器官）不仅受其正常**功能**的制约，而且受各部分连接形成更高单位（有机体的整体）的正常**性质**以及其他部分（器官）。这绝不是机械构造的情况。”<sup>97</sup>

也许，这两个类比都不是最恰当的。门格尔自己指出，自然有机体是由以机械方式发挥作用的部分组成的。<sup>98</sup>虽然对于实用主义的社会现象，他使用机械构造类比不同于他使用有机体的无意产生的社会现象，但自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以机械方式发挥作用：他使用有机体不同于机械构造，但有机体机械地运行。

门格尔在他著名的问题中涵盖了有机制度对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

“服务于公共福利并对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制度怎么会在没有**共同意志**的情况下产生？”<sup>99</sup>

在门格尔看来，历史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混淆了对有机制度的研究和具有实用主义起源的制度。门格尔认为，这是历史主义者未能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方法论混乱的结果。

---

<sup>93</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33.

<sup>94</sup> Menger-1883 [1985], p. 141: 强调的整个文本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95</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33.

<sup>96</sup> Menger-1883 [1985], p. 132,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97</sup> Menger-1883 [1985], p. 132, 脚注 46,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98</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33.

<sup>99</sup> Menger-1883 [1985], p. 146.

如果我们要理解有机制度的运作，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些制度的起源和变化有一个理论理解：<sup>100</sup>

“准确理解‘有机地’创造的社会结构的起源的方法，和解决精确经济学主要问题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sup>101</sup>

“现象的起源决不能用它从一开始就存在或最初发展的断言来解释。”<sup>102</sup> 契约主义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解释。<sup>103</sup>相反，我们应该使用精确的方法。通过使用精确方法——门格尔有时也称之为“原子”方法，<sup>104</sup>在其他地方称为“起源”（genetic）方法，<sup>105</sup>或在他的一些手写笔记中再次称为“组合”方法——，<sup>106</sup>我们努力将人类现象简化为人性最原始和最普遍的力量和冲动的表达。我们研究一般人性的哪些倾向以及哪些外部条件容易导致这些现象。<sup>107</sup>这一分析揭示了导致有机创建的制度起源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策略，如《原理》的序言中所阐述的那样，是：

“（……）将人的经济活动的复杂现象简化为仍可进行准确观察的最简单元素，对这些元素应用与其性质相对应的度量，并始终坚持这种度量，研究更复杂的经济现象如何根据明确原则从它们的基本元素中演化而来。”<sup>108</sup>

门格尔将他在自然有机体和社会现象之间所做的类比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起来。<sup>109</sup>这就是我提出第三个反对意见的地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这个比喻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其次，除了他对有机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外，他试图通过这个比喻来解释的内容也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

有机主义（Organicism）是一组哲学流派，它将自然有机体的类比——从整体上以及它们与各部分的关系——应用于不同的领域：生物学、世界观、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来自中世纪，其来源主要是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后者对基督奥体（Mystical Body of Christ）的理解。Otto von Gierke 的《德国合作法》（*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讨论了这种关系。von Gierke 解释说，有机主义者的类比既存在于社会作为有机体的观念中，也存在于对社会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解释中。<sup>110</sup>有机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概念演变成为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作为生物有机体运作。<sup>111</sup>在这个有机体中，各部

---

<sup>100</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47.

<sup>101</sup> Menger-1883 [1985], p. 159.

<sup>102</sup> Menger-1883 [1985], p. 149.

<sup>103</sup> 作为 A. Smith: 比照 id.: p. 172 和 p. 176.

<sup>104</sup> Menger-1883 [1985], pp. 139, 141, 145, 151.

<sup>105</sup> Menger-1883 [1985], p. 94.

<sup>106</sup> 比照 Hayek-1973, p. 8 和 Hutchison-1973, p. 24.

<sup>107</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224.

<sup>108</sup> Menger-1871 [1950], pp. 46-7.

<sup>109</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31.

<sup>110</sup> Von Gierke-1868 [1934, 1963] pp. 110 及以后各页和 pp. 118 及以后各页.

<sup>111</sup>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将有机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它将社会视为一个自主实体，类似于生物有机体并遵循与生物有机体相同

分“自然地”为整体的利益而运作，而整体反过来又会影响各部分。正如所解释的那样，这种类比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丧失和部分独立于整体而生存，而门格尔的情况并非如此。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城邦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类比。在这种情况下，城邦的各个部分基本上与整体分离：合唱团和歌手；船舶及其船长和船员；体操运动员；医生和他的病人。这些类比是充分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城市——城邦——是一个整体，其部分是自存的，并且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都指向整体的目的。门格尔使用的有机类比是不充分的，因为它的部分不能在整体之外生存。亚里士多德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有机类比，他将其与整体具有实质性部分的例子一起使用。例如：“城邦由不同的元素组成。正如一个生命体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或者灵魂由理性和欲望等不同元素组成，或者家庭由丈夫和妻子组成，或者财产由主人和奴隶组成，城邦也是由不同的元素组成。”<sup>112</sup>

因此，像门格尔那样将有机类比归因于亚里士多德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亚里士多德并未主导性地使用它，其次，它可能会产生误导：虽然有机类比中存在重要部分未能幸存下来，但亚里士多德却捍卫了这种幸存。门格尔使用这种有机类比的方式也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些制度，如房屋、村庄和城邦具有自然特征这一事实，并不排除作为相关制度自然过程的一部分的目的论取向的可能性或需要。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没有共同目标的个人利益导致这一目标纯属偶然。个体行动并不能自动保证按立达到普遍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必须通过努力发现和实现自然取向：它不是自发地、无意图地达到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类领域的秩序不是事实而是任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过程不是自由的。然而，据他说，在社会内部，有一些权威机构肩负着促进、帮助甚至进行必要纠正的任务，以实现共同目标。

这种观点与门格尔的不同。他实际上认为社会现象是

“个人目的论因素的非意图社会结果。(……)因为它们通常也不是社会目的论原因的结果，而是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无数努力的非意图结果。”<sup>113</sup>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会说，社会现象是无数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照顾到特定社会的普遍目标。事实上，正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德，在于照顾整个社会的目的。<sup>114</sup>此外，个人必须做的事情与普遍目的之间存在巧合：政治的目的同时是每个人的利益。<sup>115</sup>

---

的发展模式”(p. 1364)。

<sup>112</sup> *Politics*, III, 4, 1277a 7ss.

<sup>113</sup> Menger-1883 [1985], p. 158, 强调为门格尔的文本。

<sup>114</sup> *Nicomachean Ethics*, V, 1-2.

<sup>115</sup> *Nicomachean Ethics*, I, 2.

对于一些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门格尔更忠实于亚里士多德。他解释说，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现象，而是伴随着诞生的过程。<sup>116</sup>然而，门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忠诚并不完全，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像门格尔那样说本能促使人与他人交往并形成国家是不正确的。<sup>117</sup>相反，亚里士多德说房屋、村庄和城邦具有自然起源。但自然并不意味着本能，因为本能对人来说就像自愿行为一样自然。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关于城邦的行为是自愿的。此外，对于门格尔来说，城邦就是国家，这是亚里士多德强烈反对的认同。现代国家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截然不同。

鉴于门格尔的有机体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的，它从何而来？门格尔在《探究》的序言中澄清了这一点：

“在语言学研究、政治学和法学领域，新的研究取向已经盛行(……)将这些努力应用于我们的知识领域的想法是多么明显！”<sup>118</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对它们起源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有相似之处，但门格尔的有机社会制度观并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只是几次将有机类比与社会联系起来。此外，即使不考虑这种类比，门格尔关于某些制度起源于个人行为的非意图后果的想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相同制度的概念。

## 5. 结论

经济思想史学家普遍认为，有充分理由认为门格尔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篇论文对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纯洁性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反对门格尔建议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三个论点。首先，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而对于门格尔来说，它是一门理论科学。第二，门格尔关于理论研究结论的“不可检验性”的观点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在实践科学和自然理论科学中所采用的信条。第三，门格尔解释某些社会制度或现象的方式虽然使用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但并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的。

这里提出的反对门格尔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三个反对意见表明，在提出此类主张时需要谨慎。门格尔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他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将其应用于社会领域。然而，他的知识并不具备专业哲学家的精确度。虽然他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但并没有完全掌握他的精神。很明显，门格尔未能理解和解释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因为对他的思想缺乏普遍了解，而是因

---

<sup>116</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149 以及附录 VII.

<sup>117</sup> 比照 Menger-1883 [1985], p. 222.

<sup>118</sup> Menger-1883 [1985], p. 29. 在这里，他提到了他将在书中其余部分中引用的作者。威廉·冯·洪堡的语言学；E. Burke 论政治，Herbert Spencer 论伦理；C. von Savigny 神父，K. F. Eichhorn, B. G. Niebuhr 以及——在此之前——G. Hugo and Justus Möser 论法律，Albert EF Schäffle，论社会的形成（对于门格尔在《探究》中引用的作者的完整关系，比照 Cubeddu-1985）。他们都是属于新有机主义的作家。Alter-1982 和 Alter-1990，指出了他们在这方面对门格尔施加的明显影响。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在本文中使用的英文版《探究》的引言中指出了相同的观点（第 8 页）。Yagi-1997、Meyer-1990 和 Hutchison-1973 也同意。



为他对专家应该知道的具体问题一无所知。然而，这些缺点很重要，因为它们导致他得出了与他的哲学导师截然相反的结论。

## 参考文献

**Alter, M. (1982)** “Carl Menger and *Homo Oeconomicus*: Some Thoughts on Austria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VI, n°1, pp. 149-160.

**Alter, M. (1990)** *Carl Menger and the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Aquinas, T.** *De Veritate*, in *Quaestiones Disputatae I*, Torino-Rome: Marietti, 1949.

**Aristot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by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Ostwald,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Aristotle**, *Politics*, ed.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Bar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Bostaph, S. (1978)** “The Methodological Debate Between Carl Menger and the German Historicists”,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Vol. VI, n°3, pp. 3-16.

**Chamilall, N. (2000)** “La genèse du label “autrichien”: la pensée de Carl Menger”,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Vol. X, n° 1, pp. 53-118.

**Chamilall, N. & Krecké, E. (2002)** “Professor Kirzner on Carl Menger: To What Extent was Carl Menger Subjectivist?”,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 Vol. XII, n° 2/3, pp. 299-342.

**Crespo, R. F. (1997)** *La Economía como Ciencia Moral. Nuevas perspectivas de la Teoría económica*, Buenos Aires: EDUCA.

**Crespo, R. F. (2000)** *Liberalismo económico y libertad*, Madrid: Rialp.

**Cubeddu, R. (1985)** “Fonti filosofiche dell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di Carl Menger”, in *Quaderni di storia dell'economia politica*, III, 3, pp. 73-158.

**Cubeddu, R. (1993)** *The Philosophy of the Austrian Schoo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Durant, W. (1943)**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Y: Garden City Publ. Co. Inc., 2<sup>nd</sup> edn..

**Hayek, F. A. (1973)** “The Place of Menger’s *Grundsätz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J. R. Hicks y W. Weber (eds.), *Carl Menger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Hutchison, T. W. (1973)** “Some Themes from *Investigations into Method*”, in J. R. Hicks y W. Weber (eds.), *Carl Menger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37.

**Kauder, E. (1953)** “Genesis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From Aristotle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Journal*, 63, pp. 638-650.

**Kauder, E. (1957)**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he Older Austrian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Vol. XVII, n°4, pp. 411-25.

**Kirzner, I. M. (1979)** “The Entrepreneurial Role in Menger’s System”, in id.,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pter 4, pp. 53-75.

**Le Blond, J. M. (1939)** *Logique et méthode chez Aristote*, Paris: Vrin.

**Mäki, U. (1990a)** “Mengerian economics in realist perspective”, in B.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89-310.

**Mäki, U. (1990b)** “Scientific realism and Austrian explana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pp. 310-44.

**Mäki, U. (1997)** “Universals and the *Methodenstreit*: a Re-examination of Carl Menger’s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s an Exact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8/3, pp. 475-95.

**Menger, C. (1871 [195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Dingwall and B. Hoselitz of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Wien: Wilhelm Braumüller.

**Menger, C. (1883 [1985])**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 Nock; ed by L. Schneider of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Ducker & Humblot.

**Menger, C. (1892)** “On the Origin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II, 6, pp. 239-255.

**Meyer, W. (1990)** A Note on Meng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Methodus*, II/1, pp. 46-7.

**Rothbard, M. N. (1976)** “New Light on the Prehistory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E. Dolan (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 Kansas: Sheed & Ward, pp. 52-74.

**Smith, B. (1986)** “Austrian Economics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in Wolfgang Grassl and Barry Smith (eds.), *Austrian Economic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pp. 1-36.

**Smith, B. (1990)** “Aristotle, Menger, Mises: an essay in the metaphysics of economics”, in B. Caldwell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3-88.

**Smith, B. (1994a)** “Aristotelianism, apriorism, essentialism”, in P. Boettke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Elgar, pp. 33-7.

**Smith, B. (1994b)** “The Philosophy of Austrian Economics” (review to D. Gordon),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7/2, pp. 127-32.

**Von Gierke, O. (1868 [1934, 1963])**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1934) by F. W. Maitland as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panish translation (1963) by Julio Irazusta as *Teorías políticas de la Edad Media* (Buenos Aires: Huemul) of the Third Vol. of *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Yagi, K. (1997)** “Carl Menger and the Historicism in Economics”, in P. Koslowski (ed.),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 Berlin: Springer Verlag, pp. 231-58.

**Zanotti, G. J. (1996)** “Caminos Abiertos I”, in *Libertas*, 25, Buenos Aires, pp. 145-236.